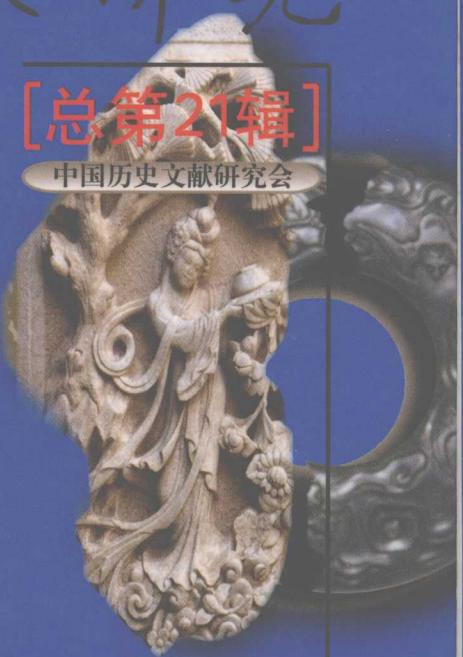


历史文献研究

[总第21辑]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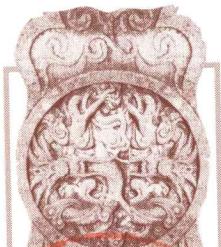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历史文献研究

[总第21辑]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LSWXYJ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武汉

(鄂)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文献研究(总第 21 辑)/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主编,一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7

ISBN 7-5622-2572-9/K.152

I . 历… II . 中… III . 历史-文献-研究-中国-丛刊
IV .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7771 号

历史文献研究(总第 21 辑)

◎ 周国林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9 电话:027-87876240)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李晓明

封面设计:甘英

责任校对:赵庆伟

督印:姜勇华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字数:338 千字

版次: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1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湖北省巴东城关清代遗迹(吴晓摄)



巴东楠木园(清)发掘遗址现场(余西云摄)



巴东义种地出土的晋代瓷质帷帐座(邓辉摄)



巴东义种地出土的晋代瓷马(邓辉摄)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瑞明 邓瑞全 来可泓 李晓明 杨昶 张新民
周少川 周国林 郝润华 顾志华 曹书杰 戴南海

主 编 周国林
常务编委 王瑞明

编委会通讯处:

邮 编:430079

地 址: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电 话:(027)87673308

历史文献研究(总第 21 辑)

目 录

20世纪后期考古新发现与历史文献研究的新使命	赵吉惠(1)
谱牒学发展的鼎盛时期	
——魏晋南北朝的谱牒学发展	仓修良(21)
巴东的考古文化遗存与巴文化动物符号的解读	
王纪潮(46)	
巴东的考古发现	邓辉(67)
寇准遗爱在巴东	来可泓(78)
川江航运与近代巴东社会经济	徐凯希(93)
郭店竹简《老子》文本分析	
刘韶军(105)	
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考论	刘固盛(121)
唐代渤海文化考略	齐振耀(132)
试论直书与曲笔对《明实录》价值的影响	谢贵安(144)
明代任瀚的文献学成就	文廷海(160)
《文渊阁书目》的版本问题	张升 王建国(171)
焦循《孟子正义》的编纂背景分析	赵庆伟(183)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比较批评方法	黄品良 庞丹丹(191)
石刻文献与《历代石刻史料汇编》	贾贵荣(202)

值得重视的鸿胪井题记刻石	孙绍华(209)
《逸周书》丛考	李绍平(216)
《汉书·五行志》考论	王华宝(229)
试论敦煌歌辞中的孝道	李晓明(241)
敦煌三“玄”	王丽英(260)
《拾遗记》及其作者	顾嵩元(272)
《开元天宝遗事》及其与《玉堂闲话》的关系	郝润华(282)
《资治通鉴》周秦汉纪史源问题	王德保(291)
关于《夷坚志》的评价及辑佚	方健(308)
胡应麟与《四部正讹》	朱华忠(323)
杨守敬学术成就简论	邹华清(330)
《清史稿·选举志》补正	夏卫东(342)
新见潘耒未刊诗抄《遂初堂诗》	朱永慧(353)
《宁古塔纪略》散论	崔曙庭(367)
刘咸炘与《史学述林》	杨燕起(381)
“高密三李”友朋书札七则	张雷逢录(395)
一部成功的年谱长编之作 ——评《陈垣年谱配图长编》	张俊燕(400)
简论电子时代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张三夕(406)

20 世纪后期考古新发现与 历史文献研究的新使命

赵吉惠

20 世纪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特别是 20 世纪后期战国竹简、帛书的多次重大发现，为校勘、考证流传于世的古代文献，为学术史、文化史研究提供了诸多前所未闻的历史新资料，推动了历史文献学研究发展到一个历史新高时期，文献学的一门新兴学科——简帛学（原有“简牍学”，但无“简帛学”）正在形成。这不但开拓了人们的历历史文献视野，扩大了历史文献研究的新领域，更在某些方面改变了传统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文献观念，推动历史学与历史文献学研究超越了传统的疑古时代，步入了以求实辨真为主要致思方向的文献学发展的新时代。如果说 20 世纪在疑古思潮的推动下，在考证、辨伪与整理历史文献（主要是诸子文献）方面取得某些重要成果与进展的话，那么在 21 世纪，我预测，必将在超越疑古思潮的引导下，进入以现代科学方法全面整理与研究历史文献，并且以重构、整合历史文献新文本为主要特征的新时期。

一、20 世纪后期历史文献的重大发现

20 世纪后期考古发现的历史文献新资料可谓丰富多彩，不胜枚举。请允许我在这里仅仅列举一些被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比

较重要的文献典籍（不可能全面），以为说明。

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东汉墓出土木牍简27400余字，经过整理确认其中最重要者为东汉本的《仪礼》。这不但可用作校勘今传本《仪礼》，而且对于研究古代礼仪文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972年4月山东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孙武兵法》与《孙膑兵法》两部孙子兵法竹简，使自《隋书·经籍志》以来失传一千余年的《孙膑兵法》重见天日，也印证了《史记》、《汉书》关于两部兵法记载的历史真实性，为中国古代军事史及军事思想史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26件，整理出文字12万余，震惊海内外学术界。其中重要的历史文献有《周易》、《道德经》、《黄帝四经》、《经法》等。此次出土的帛书本《周易》与今传本在卦序、卦画、卦辞、爻辞等方面均有重大差异，乃是前所未见的《周易》新文本，对于易学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此次出土的《道德经》，一反传本的常例，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所以实际上应该称《德道经》。与今传本相比较，除了体例之外，在文字方面也有相当差异。虽然通假字和缺文较多，但它是前所未闻的新文本。此外，还有《汉书·艺文志》以降长期被淹没的古佚书《黄帝四经》和《经法》。这些都对于研究先秦道家文献与思想，特别是研究黄老之学提供了珍贵的新史料。

1973年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的竹简《文子》残卷，大体解决了今传本《文子》真伪问题的历史悬案。今传本《文子》自汉代班固（《汉书·艺文志》以为“似依托者也”）特别是唐代柳宗元（作《辩文子》）以来，多有学人怀疑为伪书，近代以来被多数辨伪家定为伪书。然河北定县出土之简书《文子》，经整理核对，其中约有六章文字内容与今传本大体相同，个别文字可能

有被后人窜乱的情况，这不妨碍视今传本为真本。这对于研究早期道家如何演变为黄老之学，提供了难得的文献资料。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秦简1155枚，其中整理出《南郡守腾文书》、《大事记》、《为吏之道》等秦及战国时期的重要法律文书，为研究秦及战国时期的政治史、法律思想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新资料。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的竹简《周易》残卷，经整理认定可能是比帛书本《周易》更为古老的《周易》版本。从仅见的“临卦”、“离卦”、“大有”三卦的资料看出，阜阳《周易》文本与其他《周易》文本在卦画方面有明显的差异。今传本常见的阴爻画作一，帛书本画作八，而阜阳本画作八。例如临卦的卦画，今传本作䷒，帛书本作䷒，阜阳本作䷒。由此可知，自古以来卦画的划法多种多样，大体在汉代以后才定型下来，卦画也有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很可能由于地域之不同，卦画也有差异。

1979年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简牍1217枚，整理出很多有价值的各类文书、簿籍等历史文献资料。对于研究古代社会史、生活史，特别是边塞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972年至1982年在内蒙居延地区发掘了二万余枚简牍。经过整理，其中有重要的历史文献《苍颉篇》、《急就篇》，多种形式的《历谱》、《医药方》残卷，还有许多诏书、律令等残简。这些都为研究古代文化史、医药学、谱牒学提供了重要资料。

1993年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汉墓出土木牍24方，竹简133枚，经过整理共得4万余字。其中有重要历史文献《刑德行时》、《行道吉凶》等文本，还有许多重要的文书、簿籍等资料。在有关文书的简牍中，记载了汉代地方官吏设置的情况，提供了研究汉代地方官吏设置的新资料。在有些简牍中关于若干地名的记载，可以核正《汉书·地理志》中的一些文字

误差。

1993年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1号战国楚墓出土的竹简，轰动了中外的学术界，掀起了世界性研究郭店楚简的热潮。此次出土竹简800余枚，其中有文字竹简730枚，经过整理，共得2万余字，涉及10部古代重要典籍和部分从所未闻的新文献，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震惊。

郭店楚简的简文内容包括道家文献和儒家文献两部分。道家文献有古本《老子》残卷2046字，不分章次，文字规模不足流传本的五分之二。整理者根据文字内容和竹简的形制不同，分别编为甲本、乙本、丙本三组。三组的文字内容，分别见于流传本的三十一章之中，文序和许多思想内容都与流传本、帛书本有很大差异。郭店竹简中的另一道家文献，是过去从未见过的《太一生水》，计14枚简。因简形与《老子》丙组本相同，故有的学者怀疑《太一生水》是否应为《老子》丙组的内容。但是竹简整理者坚持认为《太一生水》为独立的一篇道家文献。它提供了道家最早的宇宙生成论模式。这些竹简都为研究早期道家文献及其学术思想提供了最早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郭店竹简的大部分内容是儒家文献。这些文献包括《缁衣》（与今传本《礼记·缁衣》大体相符合）、《五行》（与马王堆汉墓发现的帛书本《五行》基本一致）、《鲁穆公问》（子思为鲁穆公师）等。经学者研究考证，这些文献很有可能属于古佚书《子思子》的篇章。此外还有《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这些出土的佚文，经过学者们的研究考证，认为有的可能是佚书《子思子》中的篇章，有的可能是《礼记》中的内容。另外还有一些短简为“语录”体，不便分类，不易名篇，整理者暂以“语丛”名之，计有4篇。这些资料大部分应该是从孔子到孟子中间的佚文。对于研究从孔子到孟子的思想过渡与演变。对于研究思孟学派，对

于研究《礼记》和整合《子思子》都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1993年与郭店楚简出土前后，在湖北江陵、荆门一带又出土楚简1200余支，经过整理得35000余字，涉及80多种古文献。其中包括有《易经》、孔子的《诗论》、《孔子闲居》、《颜渊》、《子路》、《曾子立孝》等篇。这批楚简是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回的，已经整理了多年，据悉2001年底前可能正式公布，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这些竹简对于研究《周易》、《诗经》以及儒家、道家、兵家的文献典籍及学术思想，都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1993年在湖北荆门、江陵一带楚墓出土的九批竹简，已经引起了东西方学术界、文化界的普遍关注和轰动效应。在中国大陆、台湾、美国和欧洲已经召开了多次国际研讨会，对于楚简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批竹简的内容及其研究成果，可能改变某些传统的文化理念，冲破某些传统的历史文献旧观念，创建某些文化新观念，为补写或改写新的中华民族学术史、文化史做出贡献。

1996年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了大批三国时代的吴简，总数在10万枚以上，从数量上看，超过了本世纪所发现简牍的总和。这批简牍有明确的“嘉禾”纪年，故又称这批吴简为“嘉禾简牍”。走马楼简牍由于数量较大，清理工作比较困难。仅就清理的部分看“嘉禾简牍”的主要内容有：卷书类，包括佃田租税卷书、官府之间调拨卷书；官府文书类，包括官府之间的文书往来、司法审理等；户籍类，包括编户家庭情况等；账籍类，包括记录钱、布、米、租税、俸禄等状况。这些简牍对于三国史特别是吴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职官设置、文书制度、社会生活、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总之，20世纪后半期考古关于历史文献的重要发现，是令人惊喜的，已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必将为21世纪

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开拓新的思路、提出新的课题与历史使命。

二、当代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疑古与辨真

20世纪在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思潮的推动下，掀起了考辨古书的文化高潮，取得了不少令人可观的考辨成果，推进了历史学与历史文献学向现代科学形态转化的步伐。其成果主要表现在顾颉刚主编的七册《古史辨》、黄云眉著《古今伪书考补证》、张心澂编著《伪书通考》（上下两册）等著述之中。还应肯定，在疑古思潮推动下，批判和破除了传统的以“三皇五帝”为中心的神话历史系统，其贡献是历史性的，巨大的。至于他们对《周易》、《尚书》以及先秦两汉诸子书的考证、辨伪，确实大大地深化了对于中国古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顾颉刚创发的“层累式的构成中国古史”的理论也是有深刻哲理的。但是，从20世纪出土的文献新资料来检讨，疑古思潮确有过分怀疑古书之偏蔽。有些被疑古学者认定为“伪书”的古籍（参见《伪书通考》），经过考古出土新资料的证实，并非伪书，而是真实的古书。因此，20世纪后期在多次出土重要历史新文献资料的大背景激励下，许多学者纷纷参与为“伪书”辨真的工作，推动中国历史学与历史文献学进入了超越“疑古”的新时期。超越“疑古思潮”的主要学术标志，是为过去认定的“伪书”辨真，是在学者掌握历史新资料的前提下进行证古工作。

中国古代的文献辨伪工作，由来已久。孟子有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荀子在《非十二子》一文中批评子思、孟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到了汉代，辨伪工作已经展开，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做了大量的考证辨伪工作，他把辨伪的成果以小注的形式记录在每部古书的下面，凡是注明有“依託”字样

的，皆是被他怀疑为伪书的书，或怀疑作者，或怀疑作书的年代。明人胡应麟作《四部正讹》，清人姚际恒作《古今伪书考》，崔述作《考信录》等专门辨伪的著作，使“辨伪”成为历史文献学的一门专门的学问。顾颉刚在前人考证辨伪的基础上，把辨伪与研究古史有机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独立的史学派别即“古史辨派”，破坏了长期在中国史学领域占据统治地位、传统的以“三皇五帝”为中心、为主线的神话古史体系，为建设中国现代的科学史学，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功不可没。

但是，20世纪的历史文献辨伪工作，确实有扩大化之弊，而且事实上大有“伪书”越辨越多之势。例如清人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考辨了90部古书，黄云眉又为之作了“补证”。张心澂主要总结、收集了近代以来考辨古书的成果，做成《伪书通考》上下册，总计考辨了古书1104部，号称为现代总结性的辨伪书目，影响甚大，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由于20世纪特别是后期的考古新发现以及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学术转向，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不断出现为“伪书”辨真的著作，至90年代中期，这种为“伪书”辨真的工作，便形成了一股思潮。李学勤先生概括了这股学术思潮的走向，提出了学术界、史学界、古文献研究、古史研究超越或走出“疑古时代”的思想与口号，引导古文献研究、古史研究走上一条新的学术道路。与此相呼应，在李学勤先生的领导与主持下，完成了我国古史研究长期悬而未决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为夏代、商代和“共和”以前的西周历史进行了断限，确定了相对年代。

所谓辨伪和辨真的工作，其实主要是辨别古书的作者和产生的年代。书籍作为文化载体，都是由作者写成的，无所谓真伪之分。只是由于崇古或者图谋名利的原因，把自己现时写成的书，冒名假托为某部古书，既提前了写作的年代，又依托了古代的人

名（名家），在这个意义上说此书为“伪书”。所以，自古迄今辨别古书的真伪，主要是考证古书的作者和年代。例如《道德经》产生的年代、作者是谁，学术界早有不同看法，梁启超就曾经认为：老子其人很神秘，很成问题。他认为《道德经》晚出，不一定是老子所作。另外如《文子》一书，自汉代特别是唐代柳宗元以来，很多学者怀疑为伪书，并非文子所作。还有《邓析子》、《尹文子》、《公孙龙子》等书，也有很多学者怀疑为伪书。在 20 世纪经过考证与辨伪工作，古书中的“伪书”越辨越多，出现了对历史文献的怀疑主义思潮，可能对某段历史文化导致虚无主义，这是非常有害的。应当做认真的反思和检讨。下面我们将列举若干古书做出初步的检讨和论证。

1. 关于《老子》。30 年代讨论中国古史的时候，就有人怀疑老子其人的存在，有人怀疑《道德经》为伪书，有人怀疑《道德经》成书于《庄子》书之后，是道家后学依托老子之名而写成的书。可是，1973 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所藏帛书《老子》的出土，特别是 1993 年湖北荆门市郭店楚墓竹简《老子》（残卷）的出土，不但证实了古本《老子》不是伪书，而且也大体证明了生活在春秋末期那位老子其人的真实存在。我认为 21 世纪整理与研究《道德经》的主要任务是考证古本到流传本的演变关系，以探讨古本的原貌、整合与确认《道德经》的可靠文本或标准文本。

2. 关于《礼记》。过去很长时期学术界流行一种看法，即认为《礼记》不是先秦古书，可能是汉代学者研究《礼经》、治礼学的论文集。可是，1993 年郭店楚简中有若干篇章，研究者认为可能是《礼记》的佚篇，特别是其中的《缁衣》篇，除了章序有所不同之外，其他文字与《礼记·缁衣》基本相同。个别段落如《礼记·缁衣》首段“子言之”，16 章、18 章的“子曰”一段不见于楚简《缁衣》，其他从文字到内容，大体上二者相符合。

加之楚简的若干篇文字可能为《礼记》古本的佚篇的历史资料证实，流传本《礼记》大抵应该是战国古书。因为出土竹简的楚墓，已由考古学家认定为战国中期的墓葬，则墓中埋藏的简册，至少也应该是战国中期以前的古书。当然，汉代学者有可能整理过，但其原本为古书应当无疑。

3. 关于《文子》。《汉书·艺文志》著录《文子》9篇，班固注曰：“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唐代柳宗元也认为《文子》是“驳书”，即“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①章太炎则认为《文子》“半袭《淮南》”。梁启超更直截了当地说《文子》“实伪中之伪”^②。然而1993年河北定县10号汉墓出土的竹简《文子》残卷，经整理与今传本《文子》有六章的文字基本相同。核对其余文字，发现今传本有被后人窜改者，例如简文中的“文子”，今传本都改为“老子”，还有的把答问的“先生”，改变为提问的“学生”，对于简文中“平王”的文字，也有改动。从竹简提供的资料对比，虽然今传本被窜改的地方较多，但其原始本仍然应当是先秦古书，而不应被视作“伪书”。

4. 关于《易传》的作者。学术界长期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认为孔子作《易传》。例如《史记·孔子世家》谓：“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辞》、《象》、《说卦》、《文言》”。《汉书·艺文志》：“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周易，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由此形成了孔子作《易传》的传统观念。但是，后来有很多学者提出“孔子作《易传》不确”的观点，还有学者（陈鼓应）提出道家作《易传》之说，意见纷纭，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易传》的内容。其中有《系辞》6700余字，与今传本不同，另外还有《六十四卦》和卷后的《二三子问》9000余字。内容为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讨论卦辞、爻辞含义的问题，都应视为《易传》的部分。